

福建革命斗争史

读本

福建

福建省人民

政府

佈告

主席 副主席

主席 副主席

福建省档案馆编

福建省档案馆编

福建革命斗争史读本

福建省档案馆编

一九九八年五月

编辑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鉴史明今，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本馆根据馆藏档案资料和《福建革命纪实》、《福建革命历史画集》等有关内容，编辑《福建革命斗争史读本》，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福建革命斗争史读本》主要反映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100多年间，福建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反抗“三座大山”压迫，进行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

历史事实证明，革命斗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仁人志士和广大群众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成果，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出更大贡献，争取更大光荣。

本书由罗炳行、林学锋、雷乃明、朱文、林勤同志编辑，陈永成审定。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因编辑水平和资料所限，书中难免会有错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福建省档案馆
一九九八年五月

目 录

一、三座大山对福建民众的压迫·····	(1)
二、“五四”运动在福建的影响·····	(5)
三、马列主义在福建的传播和党团组织的建立·····	(8)
四、红四军入闽与“古田会议”·····	(14)
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8)
六、中央红军东征漳州·····	(22)
七、十九路军入闽与“福建事变”·····	(25)
八、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文化建设·····	(29)
九、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32)
十、抗击日军，保卫福建·····	(35)
十一、争取和平民主——进行闽粤边区游击战·····	(42)
十二、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福建·····	(50)
十三、部分革命英烈简介·····	(54)

一、三座大山对福建民众的压迫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南京条约》中，福州、厦门被划为“五口通商”的两个口岸，分别于1843年11月和1844年7月开埠“通商”。1844年，英国政府在福、厦设立了领事机构。同年，美国、法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进入福州、厦门。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把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在福州、厦门设立“警察所”，行使其所谓“警察管辖权”。1901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鼓浪屿公地章程》，将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在鼓浪屿设立行政机关“工部局”，拥有军队和巡捕，任意发号施令，滥捕中国无辜百姓，形成“国中之国”。其间，德国、荷兰、西班牙接踵而来，他们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厦门等地设立“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从此，外国资本主义以福州、厦门为跳板，打开了侵略福建的大门。

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福建后，便迅速地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经济领域。自1845年英国人在厦门开办“德记”“和记”洋行和1853年美国人在福州开办“旗昌”洋行后，福州、厦门便有了怡和、宝顺、莱士、太平、捷逊、隆顺、禅臣、三井、大板等洋行，操纵福建的财政金融。帝国主义列强还在福建各地投资办厂，在建宁、邵武、汀州三府开办金矿、煤矿，直接掠夺福建物产资源和剥削福建人民。早在1895年以前，帝国主义就在福州、厦门等地开设

船舶修理厂、石油公司、轮船公司、电报局等企业。

帝国主义分子在福建走私贩卖鸦片极其猖獗。英国人莱特说，1847年前后，厦门以及附近的泉州和金门货站，或许是全中国鸦片贮量最多的地方。据英国领事估计，1846年厦门海关鸦片走私占同年贸易总额的13%，1847年达28%，1853年高达50%。帝国主义分子还大肆进行贩卖华工的罪恶勾当，福建各地大量的破产农民被诱胁沦为“猪仔”。仅1847年至1852年，从厦门离岸的华工就有12115人。华工在国外遭受剥削者残酷的虐待和无尽的压榨，有三分之一死于非命，十分之一受伤致残。

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积极从事文化侵略，为其政治、经济侵略服务，其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传教士进行罪恶活动。据史料记载，1919年福建境内有教堂400所，传教士164名。他们除开展宗教活动，对福建民众进行精神奴役之外，还在福建各地办教会学校1709所，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他们开办的“仁慈堂”等“慈善机构”拐骗幼童、残杀婴儿，更成为残害儿童的魔窟。他们以宗教活动为名，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情报。

在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福建的同时，福建的广大农村仍处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仅占福建农村人口不至5%的地主豪绅，占有了全部耕地的70%左右，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苦农民，却不到30%的耕地。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不得不向地主豪绅租种土地和借贷维生，地主豪绅则残酷地剥削农民，榨取农民全部收获量的60%—80%的高额地租和年利率高达80%以上的高利贷。地主豪绅还拥有封建武装、私设牢狱，为他们催租逼债，敲榨勒索，强迫农民担负各种无偿劳役、定期交纳各种贡品。福建广大农民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甚至被迫流离失所，卖儿鬻女。

封建军阀在福建的反动统治和连年混战，更使福建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之下，又套上了一重枷锁。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福建的第一个代表是李厚基，他历任福建镇

守使、护军使、督军兼省长。1918年，粤军陈炯明部入闽占据漳州、龙岩、汀州所属各县，本省各地地方实力派和土匪等也纷纷趁机组成民军，福建形成了大小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福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使福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福建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一百多年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1853年，永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由林俊领导的“红线会”农民起义，起义军提出“救民除暴”的口号，发动抗租、抗粮、抗税斗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先后攻下德化、大田、永安、沙县、尤溪、仙游、永泰等县，围攻延平、兴化、泉州等府城，在仙游镇压了贪官污吏，发动连江、香田、慈孝共二百数十乡规模巨大的抗清斗争，并控制了福州至泉州的交通要道。这次起义坚持五年之久，影响遍及十余县，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福建的统治，直接配合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同年，海澄黄得美、黄位领导了“小刀会”起义，攻下石码、漳州、长泰、同安、安溪、漳浦、平和、云霄、东山等地，直捣厦门、声势浩大，地方官吏闻风而逃，起义队伍随之发展到万余人。1857年至1863年，太平军先后四次进入福建，攻占闽北、闽西南大片地区。福安、建阳、将乐、晋江等地农民还以“红白旗”、“尖刀会”、“斋教”等名义，聚众起义，策应太平军。1884年8月，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舰强行驶进马江，福建水师舰队和海岸炮兵不顾清政府不战求和的旨意，对法军的突然进攻，仓促奋起抗击，闽江两岸民众也纷纷武装参战，移石填江，封锁航线，火攻敌舰，为保家卫国喋血马江。接着，法舰又炮击马尾造船厂，摧毁闽江两岸的清军炮台。清政府在得到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以后，被迫对法国正式宣战。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下，1902年，福建也相继出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组织。如益闻社、文明社、共和山堂、汉族独立会、桥南公益社和警世社等，出版了《警世报》、《民心月刊》等宣传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刊物。

1905 年，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翌年，郑祖荫等在福州建立了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并迅速在莆田、泉州、厦门等地发展组织。1911 年春，同盟会福建支部选派林觉民、林文、方声洞、陈与桢、林尹民、陈可钧、冯超骧、陈更新等数十人参加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广州起义。这次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促进了民众的觉醒。不久武昌起义爆发，福建各地相继起义响应，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二、“五四”运动在福建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此后，“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全国，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福建人民也奋起响应，迅即汇入这一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洪流。

5月5日晚上，北京爆发爱国斗争的消息传到福州。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法政学校、省立第二中学、福建师范学校等部分学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7日，福州各校学生举行集会，并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从城内出发，冲破反动军警的封锁，到达仓前山，在日本驻闽总领事馆前示威，高呼“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随后返回城内省督军署向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请愿，并要求将请愿书转呈北京政府，李厚基被迫接受了请愿书。14日，福州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福州学生联合会”。福州学联会成立后，即领导全市学生和市民抵制日货，并创办《全闽学生日刊》、《学生周刊》等宣传反帝爱国斗争。

5月16日，厦门各校学生4000多人在厦门同文书院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等口号。17日下午，厦门钱庄公会召开会议，决定从当天起不收日币，不与日本银行来往。同一天，漳州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游行队伍先至龙溪商会门前，学生派代表求见商会会长，“请求积极抵制日货，并联合各界筹办国民大会，以为外交后盾”。商会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全国各地商会一致抵制日货，通

电南北政府（北京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拒绝“和约”签字。最后，游行队伍会集漳州公园，学生代表向群众演说，长达四小时，自行汇集而来的听众达万余人。

5月20日，厦门学生、教师及各界人士两万多人，召开国民大会，一致通过致电北京政府、“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及国内外新闻团体，呼吁拒绝“和约”签字，表示保卫青岛斗争到底的决心。21日，泉州各中、小学师生2000余人游行示威，他们手执写着“不做亡国奴”的旗帜，沿途讲演，并散发传单，群众莫不为之感动。29日，莆田各校学生1000多人游行示威。31日，长汀各界群众召开国民大会，并通电南北政府，提出拒绝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等三项要求。在此前后，闽东、闽北各县学生及各界群众也相继举行罢课、集会和游行。6月2日，厦门码头工人开始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到厦日籍船只大为减少。6月6日，厦门人民为反对北京政府大肆逮捕北京爱国学生而罢市。

在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斗争的同时，福建人民抵制日货运动也日益展开。“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州、厦门、漳州、南平、建瓯、泉州、龙岩、莆田等地人民，先后组织了抵制日货的“十人团”、“五人团”、“日货检查队”、“日货调查组”、“国货倡导会”等团体，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福建人民广泛、深入地抵制日货运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闽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十分仇恨，处心积虑地准备制造事端，妄图破坏福建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1月11日，日本驻闽总领事馆捏造所谓“日商瑞顺洋行于午后2时向桥北搬运火柴两箱，经中洲被学生押往大妙山焚烧”的事件，向福建交涉署提出处罚学生、赔偿损失、确保今后不再抵制日货等三项要求。16日下午，由日本驻闽总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指挥，纠集百余名日籍浪人组成“敢死队”，携带刀棍手枪等武器，在福州南台大桥头殴打枪击“青年会”学生黄玉苍等四、五人，连赶来劝阻的中国警察和市民也没有幸免。

巡警史孝亮中枪弹三处，学生刘开祥腿部中弹骨折，市民朱依才子弹透穿肋骨，其他数人受刀棍重伤。中国警察奉命不能开枪，但仍当场捕获以江口善海为首的日籍罪犯十名，连同凶器一并送交日本驻闽总领事馆。中国民众除轻伤不计外，经验伤的有十人，均由日本总领事派人到场认明，事件发生的当晚，福州人民无不咬牙切齿，城内城外立即一致罢市，福建学联会亦于当晚向全国及省内外各地发出通电。17日，福州各校全体罢课，商民继续罢市。下午，各界万余人召开紧急国民大会。此后，厦门、漳州、泉州等各地人民闻讯，也连日集会抗议，通电声援。然而，北京政府惟恐恼怒了日本帝国主义，密令各地反动当局取缔、镇压爱国运动。事件发生后，日本驻闽总领事馆反而捏造事实，向福建当局交涉照会，反诬中国学生截夺日本天田洋行运输中的货物，从而造成流血惨剧。同时向其本国政府请求派军舰来闽示威。22日，三艘日舰驶抵马江，23日闯到福州大桥下。这就造成了当时全国各地称之为“闽案”的福州“台江事件”。

“闽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各地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又一个浪潮。在全国人民强烈抗议和坚决的斗争面前，中日政府不得不开始派员调查福州“台江事件”。12月30日，日本政府在东京、北京、福州同时宣布撤走入侵福建的军舰。翌年3月21日，日本政府撤换驻闽总领事森田浩氏。11月12日，中日双方办理福州“台江事件”交涉，换文结案，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并赔偿中方受害人恤金1300元，赔偿顺记菜馆800元。

福州“台江事件”的发生，以及全国一致声援“闽案”、抵制日货的斗争，成为“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最后一个浪潮，既是“五四”北京爱国斗争的继续，又是“五四”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进一步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推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三、马列主义在福建的传播 和党团组织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团中央出版的《向导》、《周报》、《新青年》、《先锋》、《先驱》、《中国青年》等刊物，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福建，福建各地进步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研究、宣传马列主义。

1921年春，邓子恢、陈少微（陈明）等人在龙岩成立了“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报，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共同研究新文化、新思潮。1924年5月，集美学校龙岩籍学生杨世宁、谢景德、李联星、张旭高等，先后组织“新龙岩季刊社”和龙岩籍集美学生会，编印《新龙岩季刊》和《到民间去》。1925年，上杭县进步青年罗大准等人组织“读书会”，并油印出版不定期刊物《幻灯》。1928年3月，汀属八县在广东大学读书的进步学生谢秉琮、胡轶寰等人，在广州创办《汀雷》月刊，寄回汀属八县散发。这些进步刊物都介绍和宣传了马列主义的有关内容。

1922年10月，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福州籍团员陈任民回福州开展革命活动，创办“民社”，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同年12月，陈任民又和方尔灏等人创办《冲决》周刊，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1923年夏，陈任民等人在省立福州二中组织“工学社”，组织同学阅读《共产党宣言》及《向导》、《先驱》等革命书刊，并出版《工学报》宣传马列主义。在此前后，陈聚奎、郑松谷等进步青年组织了“青年学社福建支社”，并出版了《福建青年月刊》。同年秋，陈任民、江削五等在“民社”基础上组织“民导社”。1925

年1月，“民导社”与“青年学社福建支社”合并，成立了“福建青年社”，成员达80多人。出版了《福建青年》周刊，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号召青年和工农群众奋起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1月，徐星者、苏建维等人发起成立“福建勉之学社”，成员达30多人，大家互学互勉，共同研究马列主义，同年秋天，该社改名为“福建涤社”，创办《涤之》周刊，决心涤荡旧中国的污泥浊水。7月，共青团员翁良毓创办“福州书店”，经销马列主义书籍和党、团中央出版的刊物，成为福州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

随着马列主义在福建各地的广泛传播，许多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福建青年，开始把传播马列主义和发动工农群众运动结合起来。1925年7月，集美学校学生谢景德、林初之、谢宝萱等人利用暑假，在龙岩适中鱼亭学校举办了暑期平民学校。1926年4月，中共党员朱铭庄、郑尚衡等在福州水部门兜私立职工小学开办夜校；同年8月，集美学校学生蓝维仁、蓝为龙等在上杭庐丰创办平民学校；12月，中共党员罗扬才及李松林、董云阁等在上杭庐丰创办平民夜校。这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初步接受马列主义的进步青年在平民学校和夜校中，对工农群众和一般青年既传授文化知识，也灌输革命思想，用他们苦难生活的现实，来启发他们接受革命真理。

由于马列主义在福建各地日益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军阀以及豪绅地主阶级对此十分仇视。北洋军阀的福建督军周荫人下令各地军警当局“严禁共产宣传”，《福建青年月刊》仅出一期，即遭警厅干涉而被迫停刊；1925年12月22日，军阀政府逮捕了福建学联会理事长、共青团员翁良毓，第二天又查封了他经营的“福州书店”，并于翌年6月杀害了翁良毓。龙岩的《岩声》报也因受到地方军阀的阻挠，被迫转移到厦门出版。

从“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逐渐为福建许许多多的先进青年所接受，终于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马列主义在福

建的传播，以及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诸多进步社团组织，为福建各地建立共产党、共青团的地方组织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马列主义传播同工农义务教育及工农群众运动的结合，为大革命时期福建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了思想舆论的准备。

1925年3月，团中央派马念一到福州帮助建立共青团组织。马念一到福州后，即与此前受团中央派遣回福州开展活动的团员陈任民等取得了联系。随后，他们从福建青年社中吸收了陈聚奎、方尔灏、翁良毓等十人加入共青团。经团中央批准，4月1日，共青团福州支部正式成立，陈聚奎任书记，直属团中央领导。4月7日，福州数千名学生向省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在抵制美国在闽倾销鱼货的运动中被捕的四名学生，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造成轻、重伤130余人的“四七惨案”，激起了学生的无比愤怒。共青团福州支部即发动各界群众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全市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浪潮。

1925年7月，方尔灏作为团中央特派员，回福州传达团中央指示，整顿团的组织，成立共青团福州地方委员会，仍直属团中央领导，下辖六个支部，共有团员31人。福州团地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团支部的领导，各地团支部很快成为福州地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

1925年9月，团中央特派员方尔灏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在福州建立党组织。1926年4月初，团福州地委进行了整顿和改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福州地委，方尔灏任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同时，改组后的团福州地委亦由方尔灏兼任书记。6月，党中央派蔡珊来福州加强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工作，不久中共福州地委进行改组，蔡珊任书记。

1926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莆田青年陈国柱，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于1926年6月建立中共莆田支部，由陈国柱任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7月，陈天章等党员被派往莆田的澳柄、夹祭、山门、邦尾等地建立了农村党支部。12月，

中共莆田特区委成立，陈国柱任书记。此后，中共莆田特区委转归中共福州地委领导。

1927年3月，为配合北伐东路军入闽而来到福州的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再次改组了中共福州地委，由徐琛任书记。在党中央的指导下，福州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发展，至1927年4月，中共福州地委已有22个支部，及连江、建瓯、古田、莆田四个特支（特区委），共有党员150多人。中共福州地委所辖地区也扩大到长乐、福清、莆田、仙游、连江、罗源、古田、建瓯等县。

在福州地区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后不久，厦门地区受团中央和团广东区委的指导也建立了团组织。1925年5月，集美学校学生李觉民受上海团中央的指示，在“福建青年协进社”中物色信仰马列主义的优秀青年，筹建共青团组织。6月初，团广东区委派区委候补委员蓝裕业到厦门，开展建团工作。6月中旬，共青团厦门支部在集美成立，李觉民任支部书记，直属团中央领导，并受团广东区委的指导。

1926年2月，中共党员罗秋天按组织指示，转到厦门大学读书，并与罗扬才、李觉民组成了中共厦门大学支部，罗扬才任支部书记。2月底，罗明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到厦门招收广州农讲所学员和整顿、发展党、团组织。罗明在厦门秘密举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并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及其附近的农村、工厂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团员。3月，组建了党、团混合的厦门特别支部（即“厦特支”），由阮山任书记，下属支部有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师范部、小学部、禾山、大中街、中山中学、育清等七个支部，有党、团员43人，其中党员16人。4月，“厦特支”正式分为中共厦门干事会和共青团厦门干事会。

厦门地区建党后不久，派阮山到闽西活动，并于1926年厦，成立了中共永定支部。10月，第六届广州农讲所福建籍学员郭涵人、朱积奎等九人，由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派遣随北伐东路军回闽，

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是年冬，朱积垒等在平和建立党支部，12月，温家福、蓝维仁等在上杭建立党支部。1927年1月，陈庆隆、郭滴人、朱文昭等在龙岩建立党支部。

1926年7、8月间，上海党中央派翁振华、谢志坚到漳州开展建党活动，并成立了中共漳州支部。

北伐东路军入闽后，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领导，派原中共广东汕头地委书记罗明到漳州筹组中共闽南特委，统一领导厦、漳、泉州和闽西各县党的工作。1927年1月，罗明到厦门首先指导成立了中共厦门市委，罗秋天任书记，组织罗杨才，宣传吴世华，工委杨世宁。随后，在漳州成立了中共闽南特委，罗明任书记，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辖厦门、漳州、平和、诏安、龙岩、永定、上杭、同安、泉州、南安、永春、德化等地的党组织。

1925年下半年，在共青团组织的帮助下，福州先后成立了海员、运输、机工、洋务等工会，开展了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1927年1月，中共党员陈碧笙在福州大妙山建立了店员工会，拥有京果、布匹、百货、细木、制笔、洋衣等数十个基层工会，会员达1万余人。同期，厦门总工会正式成立，共产党员罗杨才任委员长，下辖海员、店员、印务、邮务、电气等基层工会23个，会员达万余人。至3月底，基层工会发展到30余个，拥有会员2万多人。在厦门总工会的领导下，厦门工人阶级还响应全国总工会的号召，参加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派军舰来华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全国总罢工。

1926年底，随北伐东路军回到闽西、闽南开展农运工作的广州农讲所学员，与共产党员邓子恢、林心尧、罗杨才、阮山、方尔灏、徐履峻等，分别在闽西、闽南、福州、厦门、闽北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团结国民党左派，领导各地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春，阮山、林心尧在上杭创办“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罗明、翁振华、陈庆隆等在漳州、龙岩分别开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龙）岩（漳）平宁（洋）宣